

《弥勒会见记》文学及传译价值探析

郑 玲

(宁夏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长达28幕的佛教说唱剧本,因其作为较早的文学译著而富有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价值。就其文学价值来讲,它不仅是崭新的文学样式,还是戏剧文学的素材库。《弥勒会见记》的传译不仅为丰富和发展回鹘文文献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且为审视民族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窗,还对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学带来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弥勒会见记》;文学价值;传译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7.37;I1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4)01-0093-03

一、《弥勒会见记》概述

《弥勒会见记》是一部长达28幕(1个序幕和27个正幕)的佛教说唱剧本。据回鹘文本跋文可知,《弥勒会见记》原剧本最初用“印度文”写成,后由圣月菩萨大师编译为吐火罗文,之后智护戒师又将其译为突厥语。其中,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有德国本(发现于新疆,现藏德国)和新博本(1974年发现于新疆焉耆,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有哈密本(1959年发现于新疆哈密)、德国胜金口本(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胜金口所得)和德国木头沟本(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木头沟所得)。哈密本《弥勒会见记》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德国本,它虽然仍不是完本,但大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楚该书的结构和内容。

在目前已知的回鹘文佛教经典中,《弥勒会见记》独具特色。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

1. 它是较早的文学翻译作品。《弥勒会见记》不仅是一部讲述弥勒会见佛祖释迦牟尼的佛教经典,而且还是一部由“古印度文”传译而来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无论考究其形式还是探析其内容,《弥勒会见记》都可谓史诗型壮阔宏伟的“开放式”戏剧艺术结构^[1]。该剧每幕之内细分为诸多场次,不仅明确标明演出的时间、地点和场景,同时还标以出场人物及演出曲调等。这充分体现了古代维吾尔人的聪明才智和戏剧艺术创造力。

2. 它的发现对重新审视中国戏剧史具有一定意义。《弥勒会见记》的发现,为中国古代戏剧艺术的

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比用汉文写成的剧本早六七百年”的《弥勒会见记》,无论在西域戏剧史研究还是中国戏剧史研究上,均具有里程碑意义。

3. 富有多领域的研究价值。《弥勒会见记》的发现与刊布,为诸如中亚语文学、历史学、语言学、佛教史等众多领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同时对我们研究回鹘文佛教经典的翻译过程有所启示,为回鹘佛教史、民族文化交流史和语言接触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线索。

二、《弥勒会见记》之文学价值

提及中国戏剧的形成,以往的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戏剧发端于宋末的杂剧,形成于元明时期。换句话说,宋以前的中国没有戏剧。文学史学家冯沅君在其《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论及汉唐戏剧时写道“纵观这千余年的戏剧,真是幼稚的很!既无正式的舞台,又无写定的剧本。只是随便的玩耍而已。”^{[2]214}该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主要依据是“无正式的剧本”。但是,忽视西域戏剧的存在及其对中国戏剧的贡献及影响,便急于得出中国戏剧发端于宋末的观点,未免有点偏颇。因此,关注和肯定西域戏剧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可以为我们客观而全面地审视中国戏剧发展史乃至中国文学史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季羡林先生曾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中对《弥勒会见记》的学术和历史价值作出如下论断“吐火罗语的发现有重大意义……对中国文学

收稿日期:2013-09-12

作者简介:郑玲(1979-),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主要从事历史与文化、突厥语族文献学研究。

史来讲,它保留了一些剧本,比如长达二十七幕的《弥勒会见记》剧本比用汉文写成的剧本早六七百年。”同时认为该剧作“流行于中国唐代,它比戏曲繁荣的宋、元要早得多,《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发现对中国戏剧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3]438}。耿世民先生曾言“自古以来,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不仅以歌舞之乡闻名于世,而且还以最早表演戏剧闻名于世。在历史上,新疆戏剧对内地汉族戏剧的产生和发展起到很大作用。”^[4]可见,《弥勒会见记》无论在西域戏剧史上,还是在中国戏剧史上,均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的发现不但为戏剧、小说提供了常新的内容素材,拓宽其思想表达空间,而且还为其他文学样式结构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借鉴范式。

以所述内容视之,《弥勒会见记》首先是一部借助弥勒会见释迦牟尼这一主线故事普及佛教义理的佛教典籍。尽管它历经了古印度文、吐火罗文至回鹘文的再次翻译过程,但作为文学剧本的它文学色彩不但没有褪色,反而在传入以歌舞闻名的西域地区时变得更加光彩照人。作为一部佛经典籍译著,我们不应忽视《弥勒会见记》在中国戏剧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 戏剧文学的素材库

随着佛教在西域及中原的盛行,佛教经典译著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先生曾作出如此论断“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5]179}如若我们沿中国戏剧的发展史追溯,就会发现它确与佛经翻译文学有着“亲密”关系。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佛经翻译文学是中国古代戏剧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母体”和最强有力的“催化剂”,如果没有它的影响,中国古代戏剧将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象。

佛经翻译作品之所以会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戏剧产生巨大影响,究其原因在于有的佛经典籍本身就是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故而学界称其为佛经翻译文学。与其他传世的长篇故事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法华经》一样,《弥勒会见记》情节生动,文字流畅,运用多种文学技巧,文学趣味浓厚,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该剧本以弥勒菩萨会见佛祖释迦牟尼为主线,内容丰富,无所不包,上至天堂,下至地狱,每幕之中不仅细分诸多场次,标明演出时间、地点和场景,而且标以专为演员登台演出的演出曲调等,这充分体现了古代维吾尔族先民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戏剧艺术创造力。

随着佛教的影响日隆,佛教经籍译作因其多彩的内容而拥有大批读者。以《弥勒会见记》为例,剧中的神灵鬼怪、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等因素显然给中国文学中的志人志怪小说提供了原始素材。因此,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灿烂的佛经翻译文学给中国文学特别是彼时的中国古代戏剧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后世戏剧的日臻完善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丰富的素材储备。

(二) 崭新的文学样式

《弥勒会见记》多次运用描写、虚构等表达技巧,诸如对佛祖释迦牟尼出现时的奇异景观的描写、对弥勒出家成道时众鸟兽向其忏悔场景的描写等,使得整个作品具有了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弥勒会见记》在谋篇布局上也为崭新文学样式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唐宋传奇也好,元明清小说也罢,它们一如既往地从此佛教典籍中汲取创作素材、内容上加以模仿,同时加大了对佛经译作在结构布局上的模仿力度。《弥勒会见记》以弥勒会见释迦牟尼为线索,把许多故事有机联系在一起,而实际上许多故事又各自独立,这种结构不仅影响了之后的戏剧结构,而且对唐宋传奇的谋篇布局也带来了一定影响,比如唐人王度所撰写的《古镜记》便是其中一例,它将几个毫无关联的小故事以一面古镜有机串联在一起,结构独特。

无论是魏晋南北朝盛行的志人志怪小说,还是唐代的俗讲变文、宋代的话本,再至元明清之时的章回体小说,结构上的一条主线贯穿全文,其他故事串连成文的谋篇布局特征,足以说明以《弥勒会见记》等佛经翻译文学对不同文学样式的结构布局方面带来的深远影响。

通过探析以《弥勒会见记》为代表的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的渊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来文学剧本影响本土文化的过程,对我们进一步研究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及外来文学本土化的过程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6]。

总之,《弥勒会见记》在其由西向东传译过程中,其戏剧艺术已臻成熟,而这种惊人的成熟正是多元文化营养催生而形成的。对于中国戏剧而言,也正是西域戏剧独具特色的文化个性,才赋予了它丰盈的文化魅力。

三、《弥勒会见记》之传译价值

关于《弥勒会见记》的渊源及其演变,哈密本《弥勒会见记》中存在多处记载“洞彻并深研了一切论、学过毗婆尸论的圣月菩萨大师从印度文改编成吐火罗语,智护戒师又从吐火罗语译成回鹘文。”这段记载至少说明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一,《弥勒会见记》最初是来源于古印度的梵语剧本。第二,圣月大师将此剧本改编为吐火罗语剧本。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是一部比较典型的剧本形式,标明了场次、场景变化、出场人物、演出曲调等。第三,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是由吐火罗文本传译而

来,依然保留剧本形式。

在由古印度语至吐火罗语再至回鹘语的传译过程中,《弥勒会见记》的不同译本所述母题基本保持一致,但二次翻译不可避免地留有异质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的历史印记。从某种程度上看,《弥勒会见记》的传译不仅是相关语言转换的问题,而且包含着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复杂内容,其传译价值应是多方面的。

首先,《弥勒会见记》的传译为丰富和发展回鹘文文献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尽管《弥勒会见记》主要讲述弥勒出家为僧会见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事,但在回鹘文本中我们依然可以捕捉到有关摩尼教的片段信息,比如第三品中的第9页b面的第11行中出现的“on č□šapt(十戒)”,据耿世民先生的解读,认为其与摩尼教内容相关。由此可见彼时西域多元宗教之间的互镜与融通,从中可以折射出回鹘社会发展的某些历史情况,对了解回鹘文化和宗教特点具有极高的历史学价值。

其次,《弥勒会见记》的传译为审视民族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窗。翻译,就其本质而言,实为文化与文化之交流。翻译不仅是译者跨语言体系的转化,更是一种跨文化的行为。“任何一个发展着的民族,必然要吸收可能吸收到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愈能吸收别人的长处,愈对自己有利。”^{[7]289}可见,文化交流是本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而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其托命在翻译”^{[8]156},藉翻译途径东传,与古代西域诸民族关系密切,影响日隆,与传统文化息息相通,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本文所选取的《弥勒会见记》同样是中国历史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译本对勘对研究佛经翻译在古代中外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传承发展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化交流的大视阈观之,佛经翻译所引进的不仅仅是具象的佛教经典,更是一种特有的异质文明。根植于印度文明深厚土壤的佛教是印度文明的一个重要宗教形态,是一种理念和信仰体系,它承载着印度文明独有的文化成果。凭借大量不同的佛教经典作品被译为西域各民族文字,为佛教与古代西域民族文化的交融提供了现实途径,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西域和中土既有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体系^[9]。

再次,《弥勒会见记》的传译为古代维吾尔语言文学带来了深远影响。回鹘文本《弥勒会见记》能够流布存世,得益于回鹘译者娴熟而高超的语言驾驭

能力和良好的文学修养。在对勘《弥勒会见记》两个译本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惊叹回鹘译者的多语言天赋,其在保证原文本内容不变的前提下,通达义旨,灵活运用直译、意译、改译等多种翻译方法,相得益彰,各展其长。《弥勒会见记》的传译“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10]315}。伴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大量梵文和吐火罗文的新语言要素的输入,成批的佛教词语融入回鹘语词汇中,成为回鹘语词汇大家庭的新鲜血液,丰富了回鹘语言词汇宝库。

最后以《弥勒会见记》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也为西域诸民族甚或华夏民族的文学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素材和表现形式。正如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指出的“盖有外来‘语趣’输入,则文学内容为之扩大,而其质素乃起一大变化也。”“不特为我思想界辟开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

整体而言,对勘不同译本的《弥勒会见记》为我们全面了解和蠡测佛教在西域的流布,不同语系间的语言接触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吐火罗文本还是回鹘文本的《弥勒会见记》,译本的流传都将印度佛教的精深和奥妙,经由西域引入儒家和道家占统治地位的中土,给中国传统文人和寻常百姓,提供了思考人生、探讨宇宙的另外一条新奇之路^[11]。

参考文献:

- [1]黎熺. 印度梵剧与中国戏曲关系之研究[J]. 戏剧艺术, 1986(3).
- [2]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文学史简编[M]. 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 [3]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 [4]耿世民. 古代维吾尔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研究[J]. 文史,1982(12).
- [5]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89.
- [6]焦亚璐. 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渊源探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3).
- [7]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8]梁启超. 中国佛教研究史[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9]阮炜. 翻译在佛经中国化中的作用[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
- [10]鲁迅. 关于翻译的通信[C]//黎照. 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7.
- [11]刘川. 佛经翻译家对中国文化之影响[J]. 作家杂志,2009(1).